

西方叙事学知识体系中的中国因素

——以《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为中心

曾 军

内容提要 《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是国际上第一部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中国叙事传统和叙事理论问题。编撰者以“今西”所确立的叙事学知识体系为基础，关注到了“非西方古代”叙事资源中的“差异”或特色之处。对“中国叙事传统”的介绍侧重于汉学视角，聚焦口语/书面、历史/叙事等问题，表现出编撰者个人的学术偏好；中国叙事理论的呈现形态多样，既有从非西方古代叙事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介绍，也有从西方叙事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叙事特质的发现，还包括中国学者对当代叙事理论知识体系构建的贡献。

关键词 叙事理论；知识体系；汉学视角；中国叙事传统

“讲故事”是人类共有的一种传情达意能力。伴随人类文明的演进发展，它也陆续形成具有区域性、民族性的叙事传统和叙事思想。但是，作为学科的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正式发端于法国并影响世界的一场西方学术思潮。由大卫·赫尔曼（David Herman）、曼弗雷德·雅恩（Manfred Jahn）和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共同主编的《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以下简称《全书》）是国际上第一部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它的编写目的是要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叙事学研究蓬勃发展的现实，并回顾人类文明所形成的叙事传统；它在全面展现结构主义叙事学以来所提出的各种概念、范畴、命题以及重要结论的同时，还要反映广泛渗透在从影视、歌剧、八卦、体育广播、漫画、绘本小说、讣告直到网络新媒体中出现的各种叙事问题。因此，《全书》可谓迄今叙事理论知识的集成，能够代表西方叙事研究的最新面貌。藉此，我们可以建立起西方叙事理论知识体系中代表性学者、标识性概念以及共识性命题的学术地图。

本文所要探讨的“西方叙事知识体系中的中国因素”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首先梳理在

《全书》一书中出现了哪些与中国有关的因素；其次，分析这些中国因素勾勒出了怎样的一幅中国叙事形象，这个形象背后包含怎样的西方视角，以及对对中国叙事问题的“盲视/洞见”；最后，再进一步追问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以此来反思西方叙事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特点及其问题。

一 非西方古代：叙事知识体系的古今中西问题

《全书》中与“中国”有关的辞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侧重于地方性叙事传统的辞条，如“中国叙事”“非洲叙事”“澳大利亚土著叙事”“日本叙事”和“印第安人叙事”等；另一类是侧重于地方性叙事理论特色的辞条，如“古代叙事理论（非西方）”和“古代叙事理论（西方）”。中国叙事理论归入“古代叙事理论（非西方）”中专节介绍，与之并列的还有印度、日本、中东的叙事理论。

“中国”以这种方式出场，体现了《全书》编撰者在叙事理论知识体系建构中对古今中西关系的某种立场。在笔者看来，“文论研究的基本语境是‘古今中西’。这里不仅有‘古今’和‘中西’

的时间和空间的两维,而且还有‘古中’和‘今中’‘今西’的时空交织。而在这些复杂语境中,‘今中’始终是所有矛盾的汇聚点,也是思想学术最具生产性的场域”^[1]。这一学术规律同样也适用于西方文论。当代西方学者也是站在“今西”的立场和视角来处理各类学术资源,并展开叙事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

首先,“西方/非西方”成为叙事理论区分的空间尺度。虽然叙事学的学术雄心是想建构一套普遍有效的文本分析理论,但它仍然是根源于20世纪西方的结构主义运动,并伴随着后结构主义及各类文化理论思潮的演变而发展的。在《全书》中,“非西方”被分为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非欧洲”,即欧洲之外;另一个层次是“非西方”,即在欧洲和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如在“古代叙事理论(非西方)”的最后一小节用了“今日非欧理论”(non-European theories today)的提法并同时与“非西方叙事理论”(non-Western narrative theories)交替使用^[2],显示在“西方”内部也存在“欧洲/非欧洲”的区分。再比如在“长篇小说”辞条中,编撰者按照西方主要的小说理论区分了“小说”和“罗曼司”,并着重介绍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思潮变迁。作者明确指出:“小说主要被视为一种西方体裁,比如说,并不试图融入日本的(11世纪紫氏部的《源氏物语》)、中国的(16世纪的《西游记》),或者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的传统)作品。这些丰富的非西方叙事传统不属于本简介的范围。”^[3]

其次,“非西方”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同时还包含着时间因素,用来意指“前现代”甚至是“前文字”这类指涉远古、传统的意义。比如,用西方/非西方将“古代叙事理论”分列为两个单独的辞条;再比如在“主角”(hero)这一辞条中,编撰者明确强调“非西方(经常是前识字)文化”(non-Western[usually pre-literate] cultures)^[4]。从“古今中西”的角度来看,“古代非西方”是与“古代西方”相匹配的概念,用来标识有别于“古西”之外的其它叙事传统。但是,能够与“今西”相匹配的“当代非西方叙事”则明显薄弱,仅仅在“古

代叙事理论(非西方)”辞条的末尾以“今日非欧洲理论”百余字的篇幅概述。这表明,自进入现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在发展中占据支配性地位。

再次,在“非西方”中,“东方”与“西方”构成了可以与“西方”在知识体系上形成相对独立、且能够交流对话的主体。无论是“非洲叙事”“澳大利亚土著叙事”还是“印第安人叙事”,都强调了在这一特定区域中叙事的“土著”身份,表现出编撰者希望剥离殖民主义影响的动机。编撰者重点关注的是非洲土著、澳大利亚土著以及北美土著印第安人在被殖民之前的漫长历史中的口头讲故事的传统,着重分析的是口传叙事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对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多学科参与的跨学科研究需求。同时,编撰者也注意到了他们被殖民之后,白人用文字记录、转述、编辑这些口头叙事的问题。编撰者关注更多的是这些叙事的人类学意义,但并不认可它们在叙事学意义上的独特性。正如“非洲叙事”在讨论“非洲叙事的‘非洲性’”问题时所指出的:“是否有一种独特的、本体论的将非洲叙事标记为非洲的因素?答案很简单:没有。非洲叙事的‘非洲性’仅仅存在于非洲叙事产生的文化和历史的特定语境之中。”^[5]

但是,编撰者在处理“东方”的中国、日本、印度等叙事时,态度和方式就明显有别于对待非洲、澳洲和北美的只是具有地理区域属性的土著叙事。主要表现有三:其一,编撰者是将中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叙事作为相对独立完整的民族属性和文明形态的叙事类型展开分析的。其二,编撰者都注意并强调了书写系统——文字——之于叙事的重要性。如中国叙事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从“文”(wen)这个文学艺术的总称概念开始的;“日本叙事”所重点强调的也是以文字为载体的书写叙事传统,强调“抒情诗和歌曲是日本最早的写作体裁”^[6];印度在现代有漫长的殖民历史,因此在对印度叙事传统的命名上,编撰者并没有采取“印度叙事”这一方式,而是选择了“梵语叙事”(Sanskrit narrative)这一标识着印度古代文明的标志性因素。其三,编撰者还注意到,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印度,都经历了现代化和部分殖民化的过程,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叙事传统的影

响。不过，它们的文化传承力量仍然非常强大。进入现代阶段的中国、日本、印度的叙事也并未与传统彻底断裂，而是受到西方叙事观念和本土叙事传统的双重影响。

最后，编撰者自觉不自觉地以“今西”所确立的西方叙事理论体系的视角，更多关注“非西方古代”的叙事资源中的“非叙事性”的“差异”（特色）之处。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代表的叙事学理论确立了几个基本的叙事分析基础：一个是以托多洛夫、罗兰·巴特等为代表，继承和发展了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将“功能”作为叙事分析方法的核心予以确立；另一个则是以热奈特为代表，在柏拉图的“讲述”和“展示”二分的基础上发展出聚焦“叙述者”和“叙述行为”的叙述话语理论。但是，编撰者并没有直接简单套用当代西方叙事理论中的概念去“发现/发明”非西方古代叙事理论，而是用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审美范畴和文学观念来替代“叙事理论”问题。如介绍印度时，着重介绍的是“味”“韵”美学；论及日本，则介绍的是“物语”概念；讨论到“中东”时，则关注的是文学的伦理问题，突出“虔诚”和“同情”这两种有别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恐惧”和“怜悯”的情感。同样，面对中国，编撰者也着重介绍的是中国古代的“文”“道”观念及其影响。

二 中国叙事传统：汉学视角及其学术偏好

“中国叙事”以一个独立辞条出现在《全书》之中。编撰者首先从中西叙事传统的比较出发，提出中国叙事受书面叙事占绝对主导地位影响的观点，并认为“文言”传达的是精英文化立场，因此更强调历史、真实和严肃的道德关切；“白话”更倾向于满足百姓娱乐需求，因此更适合想象、虚构和“演义”。基于这些判断，编撰者建构了中国叙事从书面叙事向口语叙事（或“白话叙事”）演进的发展脉络：《左传》被认为是以文言作为载体的第一部真正的中国历史叙事史书，并强调“礼”在历史叙事中的重要作用。司马迁的《史记》标志着“中国叙事朝着虚构化的方向迈出了巨大的一

步”^[7]。进而，经过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形成明清的“小说”。直到20世纪，“白话叙事”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领域。在这一框架下，编撰者展开了中国叙事从文言到白话、从历史到想象、从道德规训到个人情感、从文人精英到底层大众的转型过程。应该说，能够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将中国叙事传统如此丰富的层面呈现出来，着实体现了编撰者非凡的学术功底。

不过，辞条的编撰一方面要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避免不了学者个人学术的倾向性和视野的局限性。“中国叙事”这一辞条的编撰者是美国华裔汉学家黄宗泰（Timothy C. WONG）。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以及20世纪以来的通俗小说研究方面，著有《吴敬梓》《星期六的故事：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上海的夏洛克：程小青的侦探小说》等。他从“中国叙事”所依赖的语言——汉语——的特殊性出发，从叙事媒介和叙事内容两个维度展开中西文化“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发展中的悖反现象的分析。

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展开对中国思想文化分析一直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维度，这一角度甚至对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产生重要影响。黄宗泰对中国叙事的研究在这一大的学术氛围的影响之下，结合自己对中国晚清民国俗文学的兴趣，更多受到了梅维恒和沃尔特·翁等人的学术影响^[8]。

梅维恒是著名的敦煌学家，著有《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等。他认为，佛教传入导致中国“叙事传统的实质性中断”，进而将之上升到“中国文学中的叙事革命”的高度来认识敦煌“变文”的地位^[9]。梅维恒的看法其实还可上溯至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ek）。在《唐五代变文对后世中国俗文学的贡献》一文中，梅维恒明确征引普实克的“我们可以认为中国通俗故事和小说——它们一直存在到近代晚期——的产生年代不晚于唐代”的看法^[10]，指出“本文的目的便是汇集研究各种中国体裁的学者们所作出的一些重要发现，并以此来支持普实克的观点”^[11]。黄宗泰在文中对“变文”地位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从普实克

到梅维恒的看法,认为变文“证实了佛教在使叙事想象从事实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和发展书面白话的作用”^[12]。不过这一观点并未形成学界共识,即使是在美国也受到了如肯尼斯·J·德沃斯金(Kenneth J. DeWoskin)等人的质疑,指出其对中国的“历史”和“叙事”关系的理解有些偏颇^[13]。不仅如此,黄宗泰还赞同梅维恒的文言“从来没有贴近反映任何一种汉语语系口语的同时代的活活活”的看法^[14],而人为夸大了“文言”与普通百姓生活之间的隔裂。

沃尔特·翁出现在参考文献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作为一位媒介环境学家,翁致力于研究的是声音和文字作为语言的不同媒介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所扮演的不同作用。他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一书中有一个关键性的观点影响到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判断。翁特别强调“语言的口语属性”。与之相比,文字的产生虽然是语言发展之必然,但“书面语是语词的遗存”^[15]。在翁那里,口语文化居于某种类似“语音中心主义”的优先于书面文化的重要位置,他将研究聚焦于“不知文字为何物的文化”——“原生口语文化”(primary orality culture)上面,同时创造性地将受电话、广播、电视等电子设备影响下而形成的文化称为“次生口语文化”(secondary orality culture)。正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黄宗泰将中国语言文学的“文言”和“白话”对立起来,并做出从“文言”的“书面文化”到“白话”的“口头文化”转型的历史性叙述。不过,中国叙事中的“文言/白话”和翁所说的“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并不处于同一逻辑层面。从口语文化/书面文化的角度来说,所有的人类文明都先后经历了从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的转型。中国叙事其实也经历了从诗经、乐府的“以文录音”向楚辞、论语的“以字载意”的过程,其背后所包含的也是从“说—听”的口传文化向“写—读”的书写文化发生的转变。而从文言/白话的角度来看,“变文”所推崇的口语化并非“弃文(字)从(声)音”,而只是强调书面文化的大众化、世俗化过程。用本辞条中所使用的术语来说,中国叙事的转型经历的不是从“书面叙事”(written narratives)向“口语叙事”(oral narratives)或“白

话叙事”(vernacular narratives)的转型,而只是在“书面叙事”内部的从“文言”向“书面白话”(written vernacular)的转型。黄遵宪所说的“我手写我口”^[16]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都是书面文化内部的变革。此外,“白话文运动”在口语化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受西方语言影响的“欧化”因素,“把西语的话语方式用白话的形式传达出来,这就是‘国语’即现代汉语”^[17]。很显然,黄宗泰不仅混淆了“文言/白话”与“口语文化/书面文化”的关系,而且还忽略了白话文运动中语言变革的复杂性。

从叙事内容的角度来看,中国叙事的“史传”传统已得到中西方学界的公认。因此,黄宗泰从《左传》《史记》的“历史叙事”开始讲起便也是完成中国叙事传统知识化过程的重要体现。除了前面从“文言”到“白话”的线索之外,黄宗泰还勾勒了一条从“史传”到“演义”、从“伦理”(“礼”)再到“抒情”(“情”)的线索,并将这三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对中国叙事传统的历史描述。前者处理的是历史与叙事的关系问题,后者包含了叙事与抒情的关系问题。背后也都包含着对中国叙事传统关键性问题的回应。在《论中国叙事文学的批评理论》中,浦安迪就明确提出研究“中国叙事”的三大困难中前两个就是“叙事与抒情”和“史传与小说”。黄宗泰在辞条撰写中虽然没有明确征引浦安迪的相关理论,但将其列入参考文献就足以显示其学术思想的来源。

不过,可能是受篇幅所限,黄宗泰在对中国叙事传统的勾勒中还存在一些疏漏和简化。比如说,黄宗泰固然强调了浦安迪对“史传和小说具有内在的共通性”的维度,但“史传”之前的“寓言”、与“变文”同时的“传奇”、“小说”内部的从“话本”到“章回”的演进,以及中国悠久的文人笔记小说和民间戏曲传统等因内容的缺失也使得这一“中国叙事”单薄了不少。再比如分析《水浒传》时,黄宗泰强调它之所以能够被命名为“小说”,是因为它是一种“次要叙事”,“保持了与历史真实的距离,有着明显的口头讲故事中才有的天马行空的想象”^[18]。这显然也是建立在西方叙事学关于“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想象”二分基础之上

对“传达功能”(transmission function)与“讲故事功能”(storytelling function)的二分基础之上的。但是,从中国叙事传统自身的发展来看,“演义”也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是要依托特定的历史事实和相关重大事件的。因此,无论是“史传”还是“小说”,其实都是“传达”历史真实和“讲故事”的虚构想象的综合形态,只不过比重有所不同而已。

综上所述,《全书》对中国叙事传统的介绍主要是以西方叙事传统为参照系,基本反映了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总体认识,其中也包括编撰者的个人偏好和视域局限。

三 非西方叙事理论:中国特质和中国贡献

除了“中国叙事”这一辞条之外,《全书》还有不少辞条部分涉及中国叙事传统和叙事理论的内容。如“古代叙事理论(非西方)”中对中国的专节介绍,在“遍历文学”(ergodic literature)、“框架叙事”(framed narrative)、“本体诗学”(ontological poetics)、“二十世纪:后现代主义”(the twentieth century: postmodernism)等许多辞条中或多或少也涉及到与中国文学和叙事相关问题的分析。不仅如此,中国学者申丹还作为编撰者参与了部分辞条的撰写。因此,《全书》中所包含的叙事理论的中国特质和中国贡献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作者导向的叙事理论:非西方古代的中国叙事理论

“古代叙事理论(非西方)”的作者是帕特里克·科姆·霍根(Patrick Colm Hogan)和Lalita Pandit(拉丽塔·潘迪特)夫妇。他们在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尤其是印度文化的研究的同时还从事认知叙事学的研究。他们将中国古代“文”“道”“经”的复杂关系纳入西方文论关于传统、作者、社会和自然四者关系展开分析,提出中国古代的叙事理论具有与当代西方叙事理论非常不同的“作者导向的叙事理论”(author-oriented theory of narrative)的特点,并直接用“文学理论”而非“叙事理论”来处理非西方古代叙事理论问题,并认为“它暗示了当代主流叙事观点的局限性”^[19]。

在他们看来,“文”就是一种“模式”(pattern)、一种“规范”;“文”源于“道”,但并非与“道”简单对应。只有“经”才是“道”最重要的体现。这里的“经”就是指“圣人”所撰写的“经典”,并由此成为“文”必须要面对的“传统”。应该说,他们对“文”“道”“经”三者关系的解释是基本符合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精神的,与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所讲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思路大体相当。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霍根他们有可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圣人”思想,而与“君子”观念以及陆机《文赋》中的“才士”概念相混同,再结合文艺创作心理的一般规律,将之描述为一种“作者”的创作活动了。这就是他们在后文中认为的,面对“文学传统(经典)、作者、社会和自然”,刘勰、陆机更倾向于强调“灵活的适应性”以平衡这四者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创作主体(作者)的规训。他们将陆机的“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描述为作者在构思中“进入孤独”和“自由写作”状态,从而完成“将个人的内在方式添加到经典、社会和自然的方式中”的过程;同时,也将刘勰的“修身贵文”发展为“作者的道德和身体训练”,甚至认为“作者的身体健康必然是规范的、以作者为导向的叙事理论的一部分”^[20]。

显然,霍根他们对中国的“文道”关系的理解套用了柏拉图“摹仿论”的三重摹仿的理解图式;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强调其中的“再现”关系,而是突出了“表现”的可能。即辞条中所说的“经典虽然重要,但它们并不提供僵化的规则。它们是道的可变表现的那一部分,因此是能够根据当时的情况加以改变的”^[21]。这就赋予了“文学之文”的作者以更大的创造性空间。

(二)非叙事的叙事性: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叙事特质

尽管《全书》想尽可能客观呈现非西方古代的中国叙事传统及其叙事理论,但终究摆脱不掉已经发展成熟的西方叙事学知识体系的学术视野。因此,编撰者更容易发现的中国叙事特质往往是并不符合叙事性的叙事因素或叙事特点。

在“古代叙事理论(非西方)”辞条中,编撰

者重点强调了金圣叹叙事理论中两个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特点：一个与“节次”“过接”（temporal sequence）有关^[22]，尤其是“章回”转换时那种“争取一种连续性或突然变化的感觉”；另一个则是“章法”（parallels across episodes）问题。^[23]即在不同的章回之间，“事件、人物、意象等等会以一定的变化间隔重复，或建立起相似性，或显示出对立性”。虽然编撰者对金圣叹的理解有鲜明的结构主义色彩（前者解决的是“组合轴”问题，后者解决的“聚合轴”问题），但是这种二元对立、对位互补的关系明显溢出了以“行动及其功能”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叙事学理论体系。

类似情况在《全书》还有不少。在“说教叙事”“遍历文学”“框架叙事”“后现代叙事诗学”等辞条中，我们能频频见到与中国叙事相关的内容。虽然大多是只言片语，许多问题只是点到为止，但是仍然足以勾勒出西方叙事理论对中国叙事特质的想象或者发现。

“说教叙事”强调的是一种主要用于道德教化和知识传播的叙事方式，如古代的寓言、机智故事和当代的教学故事等。“中国孔孟的哲学轶事”与各大宗教（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的寓言故事、伊索或拉方丹的幽默动物寓言以及波斯诗人萨迪的机智故事等都被视为是“说教叙事”的代表。由此可见，“说教叙事”在西方和非西方的古代叙事传统中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文以载道”的观念也成为西方叙事学研究者观察非西方叙事传统及其特质的一种视角^[24]。

“遍历文学”来自爱斯潘·阿尔萨斯（Espen J. Aarseth）在《赛博文本：遍历文学透视》的命名。该辞条也是由他本人撰写的。“遍历”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的“*ergon+hodos*”，“用来表示文学作品生产出一种能够带来不同的阅读方式的符号序列”，如各类网络小说、电子游戏、故事和诗歌的自动生成器等都是数字时代基于网络新媒体而生产的类型。阿尔萨斯将这种由读者积极参与、可以变换不同方式重复体验的“遍历文学”上溯到了中国古代，认为《易经》可以被视为最早为人所知的遍历文本之一。这种“遍历性”已成为后现代小说诗学的特征之一，并成为对线性叙事的超越和挑战。正

因为如此，阿尔萨斯将“遍历”与“叙述”对举，称之为“冲突的诗学”^[25]。

从这些辞条来看，“说教叙事”强调的是言在此意在彼的“寓言式结构”，“遍历文学”凸显的是一种空间“路径”上的无限可能性，“框架叙事”则显示的是由“叙述话语”所建构起的递归结构。它们共同实现的，都是对以线性时间为主导原则建构起来的叙事原则的颠覆和超越。中国叙事所具有的“非叙事的叙事性”形象也便可见一斑。

（三）西方叙事理论建构中的中国贡献

《全书》中还有一位中国学者申丹非常特殊。她作为该书顾问编辑中唯一的中国学者，撰写了多个西方叙事理论中的关键性辞条：“*diegesis*”（包含热奈特的“故事”和柏拉图的“叙事”两种含义）、“*mind-style*”（罗杰·福勒的“心理风格”）、“*mood*”（热奈特的“语式”）和“*narrating*”（热奈特的“叙述”）以及“*story-discourse distinction*”（托多罗夫的“故事与话语的区别”），显示在西方叙事理论研究中，申丹的研究已得到了西方学界认可^[26]。

虽然叙事学是首倡于西方，在结构主义思潮中孕育而生，并伴随数字新媒体的发展而成为枝繁叶茂的理论学科，但人类“讲故事”的天性以及所形成的世界各地的叙事传统和与叙事问题相关的思想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因此，对叙事问题的思考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共同的问题。申丹这一个案背后还包含着一个庞大的中国叙事学研究群体的集体努力。近几十年来，围绕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如董乃斌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赵炎秋的多卷本《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中西叙事传统比较（傅修延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及直接与西方叙事理论展开学术对话的学者（除申丹外，还有赵毅衡、乔国强、尚必武等）蔚为大观，体现了中国学者参与叙事理论知识建构的努力和实绩。

结 语

叙事学作为学科主要是在当代西方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全书》在叙事理论知识体系建构中表现

出非常鲜明的“西方主导”(Western-oriented)的特点,主要存在两个视域局限:其一,对非西方叙事资源的借鉴和了解还比较有限。除了西方汉学家之外,西方叙事理论研究的学者绝大多数都极少涉及中国叙事传统和叙事理论问题。只有个别学者,如霍根、基思·奥特利等,对中国叙事问题偶有涉猎。其二,对非西方叙事资源的接受和分析具有“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全书》的三位主编全部都是致力于认知叙事学的学者^[27]。认知叙事学预设了一个无差别的认知读者的存在。当他们以此来关注非西方叙事传统和叙事思想时,研究的目标并非认知叙事在不同区域、民族和历史时期的差异性,而是认知叙事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而这正好包含了以西方模式阐释非西方样本的问题。如他们发现,非西方叙事传统中,无论是印度、中国还是日本,都非常强调作者在创作中的情感表现,关注叙事与道德的关系,讲究叙事对读者产生的阅读效果。他们将这些既有的叙事传统和叙事理论的资源视为叙事学展开认知分析提供研究视角和理论佐证。因此,中国叙事学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克服“西方主导”下的路径依赖,摆脱由西方叙事学所建构的“非西方古代”的叙事形象,通过积极参与共同面临的当代叙事问题的解决来获得与西方叙事学并驾齐驱的世界性影响,共同推进叙事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ZDA1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1] 曾军:《关于中西文论“对话主义”研究方法的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 [2][20][21] Patrick Colm Hogan and Lalita Pandit, “Anci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Non-Western)”, Ed.by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Marie-Laure Rya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18, p.16, p.16.
- [3] Howard Mancing, “Novel”, Ed.by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Marie-Laure Rya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399.
- [4] Dean A.Miller, “Hero”, Ed.by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Marie-Laure Rya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212.

- [5] Harry Garuba, “African Narrative”, Ed.by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Marie-Laure Rya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9.
- [6] Michael G.Watson, “Japanese Narrative”, Ed.by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Marie-Laure Rya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265.
- [7][12][14][18] Timothy C. Wong, “Chinese Narrative”, Ed.by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Marie-Laure Rya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62, p.62, p.62, p.62.
- [8] 黄宗泰还借鉴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的“表演性”理论,从口头文化的表演性角度来探索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特征。参见 Timothy C. Wong. “Orality in Performance:The Art of Classical Xiaoshu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01)2005.
- [9] Victor H.Mair. “The Narrative Revolu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Ont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 Vol.5, No.1/2(Jul.,1983). pp.1-27.
- [10] Jaroslav Prusek,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Collection of Studies*.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0, p.245.
- [11] 梅维恒:《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杨继东、陈引驰译,第247页,中西书局2011年版。
- [13] Kenneth J. Dewoskin, “On Narrative Revolutions”,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 5, No. 1/2 (Jul., 1983). p.30.
- [15]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16] 黄遵宪:《杂感》,《人境庐诗草》,高崇信、尤炳圻校点,第14页,文化学社1930年版。
- [17] 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第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 [19] 本辞条开篇即指出:“早在现代全球文化兴趣的数个世纪——有的甚至几千年——之前,印度、中国、阿拉伯世纪和日本就已经发展出文学理论传统了。这些传统中的作品并不总是与大多数欧美理论家所认为的叙事理论的典型案例相类似。”见 Patrick Colm Hogan and Lalita Pandit, “anci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non-Western)”, Ed.by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Marie-Laure Rya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14.

[22] “时序” (temporal sequence) 是西方叙事学的概念, 在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中并没有直接的对应词。从后文的具体描述来看, 可能是金圣叹的“节次”“过接”的概念, 所谓“有节次, 有间架”“过枝接叶”“移云接月”等, 讲的是小说章回中章与章、回与回、节与节之间的次序安排、过渡、衔接等。

[23] “parallels across episodes”并未出现在西方叙事学术语中, 显然是对金圣叹术语的英译, 用来表示金圣叹所强调的在章回之间出现的各种成对出现的性格、情节、意象之间的平行、对立、互补、照应等各类结构性关系。

[24] 撰写“说教叙事”辞条的马丁·科尔塔奇 (Martin Cortazzi) 是一位应用语言学的学者, 因此他更多地将“说教叙事”作为一种教学手段来看待, 认为“它不再被视为强加道德义务的手段, 而被视为多元阅读的来源”, 并认为在当代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出现了“说教叙事的复兴” (Martin Cortazzi, “Didactic Narrative”, Ed. by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Marie-Laure Rya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107.)。

[25] Espen J. Aarseth, *Cybertext: perspectives on ergodic*

literatu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92.

[26] 希利斯·米勒认为, 申丹是“一位在叙事学和文体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 她的《短叙事小说中的风格与修辞: 显性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一书“发展了一种关于叙事进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严谨和迫切的强有力的新理论”。见 Hillis Miller, “Foreword”, Dan She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Routledge, 2014, p.v. “隐性进程” (covert progression) 一词并未出现在《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一书中, 这是申丹在“叙事进程” (narrative progression) 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27] 大卫·赫尔曼的《假定聚焦》《故事逻辑: 叙事的问题及可能性》《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等建构起认知叙事学的理论体系; 曼弗雷德·雅恩发表于1997年的《框架、优先选择与解读第三人称叙事: 建构认知叙事学》一文被认为是“认知叙事学”理论的起点; 玛丽-劳尔·瑞安凭借其娴熟的计算机技术和软件工程师身份, 有效建立起叙事学与认知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的关联。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吴子林